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丛书主编 陈雁 王政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主编

王政 高彦颐

女权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而它在局部区域被接受的历史，也就是翻译作为区域间权力制衡的历史。本书将19世纪末到当代的中国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讨论分析这样一个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復旦大學出版社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丛书主编 陈雁 王政

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主 编

王 政 高彦颐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王政,高彦颐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ISBN 978-7-309-12188-9

I. 女… II. ①王…②高… III. 女权运动-传播-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091 号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王 政 高彦颐 主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22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188-9/D·800
定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编者前言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的出版动议起于 2005 年，它精选自中国大陆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系列教材。2005 年年初，由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王政教授牵线，复旦大学与密西根大学高层领导面晤商谈两校全面合作协议。王政教授提出的设立两校合作的社会性别研究所和开办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的动议得到了两校高层的共同认可。该项目争取到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于 2006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这一中国大陆首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包括七门核心课程，共计 21 个学分：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社会性别与历史、社会性别与社会、社会性别与文化、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跨国女权主义。这七门课程全部由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主讲，由国内青年学者担任助理教授。这七门课程和任课教授分别是：

“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卡罗·波德(Carol Boyd)，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所长、护理学院教授；

“女权主义理论”，塞东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密西根大学的学院荣誉教授(Martha Guernsey Colby Collegiate Professor)、英文系系主任；

“社会性别与社会”，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纽约大学教授；

“社会性别与历史”，王政，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

“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学院荣誉教授；

“社会性别与文化”，派茨·雅格(Patricia Yaeger)，密西根大学英文系学院荣誉教授(Henry Simmons Frieze Colleg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Women's Studies)和薇乐芮·查博(Valerie Traub)，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教授、妇女学系系主任；

“跨国女权主义”，伊丽莎白·温戈茹伍(Elizabeth Wingrove)，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近十年来，众多国内高校教师热情地推动发展、建设全新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所大学(占高校总数的十分之一)开设了妇女学课程。但迄今为止，这些繁荣和发展并未得到主流学界的充分认可与尊重，妇女学者执着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努力仍在学界与高等教育界的边缘徘徊；而学界对妇女学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随处可见。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要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学科化、体制化迫在眉睫。

从妇女学在美国高校的发展历史来看，妇女学在高校学科化，建立自己的系、所，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对于妇女和社会性别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美国有692所大学设有本科专业的妇女学系或中心，有51所大学可授予妇女学的硕士学位，15所大学在培养妇女学的博士。作为美国妇女学教育重镇的密西根大学，它所采取的相关系科与妇女学系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模式，因为易于向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和传统学科渗透融合，也显得更有活力。

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妇女/社会性别学经过近30年的发展，类似“妇女研究中心”的机构在各地高校随处可见，但绝大多数以课题研究和妇女维权为主要工作，并不直接参与妇女学教学实践和高校课程内容改革。虽然大量的与妇女相关的课程在本科与研究生层面开设，但受制于教育体制与传统学科设置，课程难以全面规划，教授没有交叉合作，在校零星开设妇女学课程的教授往往缺乏体制支持。除中华女子学院这

样的女子院校之外,成立“妇女学系”几乎成了中国妇女学者遥远的“理想国”。“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学术”引以为豪的创新性、挑战力也因此大打折扣^①。

与学科的体制建设举步维艰同时并存,束缚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相关师资力量的稀缺,难以满足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对这一新兴知识领域的渴求。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框架的各类学术研究尚未进入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主流,即使在冠名为“妇女学”“女性学”的课程中也并非都具有清晰的女权主义学术理论和立场。“打着妇女/性别学的旗帜,在高校课堂照搬各种旧的等级架构或继续制作女性气质、延续性别不平等的课程、写作还很有市场;即使那些想用新的理论、方法来进行变革的学者,也处于革故布新的‘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痛苦中。”^②要巩固与发展这一新生的学术领域,迅速地在高层次培训一批青年学者变得至为重要。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发展需要一批有扎实学术基础和全球视野的学者,来担当各自学科的发展和中國知识构成的转变中的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正希望能够在这一层面有所助推。

作为一次中美合作办学的实践,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全部主讲教授均来自美国高校,所选用的阅读材料多由英文撰写,多数课程的授课语言也是英文——这使学员们能够有机会接触英语世界的最新学术前沿,但是“翻译”也就成了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正如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所强调的,我们同样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考量东西方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成的可能性,就这种“跨语际实践”对教学过程的深刻影响抱有足够的警惕^③。中国当代妇女学科的建设、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的传播在

① 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少数院校经过多年努力,在社会学系下面设立了妇女学的硕士点,但至今未有任何一级或二级学科下设有妇女学的博士点。

② 杜芳琴:《妇女学在中国高校:研究、课程和机制》,《社会性别》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得益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妇女学理论及教学本土化的反思方兴未艾,这个博士课程班的开办也正是希望在博士生培养层面真正践行本土化的实践——显然这一挑战是巨大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高校掀起了编辑、出版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教材的高潮,这批教材对于推进高校的妇女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批教材主要针对本科教学,多停留在对基本理论的介绍与普及阶段,对于国际学界近年来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颇为欠缺。而教材的编定与出版,对于在高校确定女权主义话语的合法性尤为重要。教材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更将影响到妇女学在高校的地位与发展前景。

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博士课程班所使用的教材、阅读材料绝大多数来自英文语境,教材与阅读材料的编排、翻译耗费了项目组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我们对于以英语世界(不仅是西方)最新学术成果为核心教学内容的坚持,基本得到了学员的认同。我们的这种坚持首先得益于授课的美方教授对英语世界最新学术成果的熟稔,而她们深入浅出的解读更是中国学员获益的主要源泉之一。

这种坚持还基于我们对当下国内妇女学科建设的反思,面对英语学界理论与研究成果绝对的强势,光靠摇晃“本土化”的大旗常显底气不足;而对于国际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各相关学科、具体的学术成果的了解、分析、吸收和批判却远嫌不够。社会性别学术在全球各地区发展迅速,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中,博士课程班七门课的任课教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全球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地方化的问题,并自觉地将这些话题引入课程阅读与课堂讨论,介绍了不少研究世界各地社会性别议题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

近代以来,“翻译”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问题。中国女权主义学者若欲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开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翻译”显然是一个虽然痛苦却不可逾越的相伴过程。因此,我们丛书中就有专书讨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而我们的这个博士课程项目更是一次

艰难的“跨语际实践”，在这里翻译不再是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而是来自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以及社会实践的探讨、争辩和反思。它对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理论，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学科的“本土化”，意义深远而重大。

我们清醒地看到：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培养中国自己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术力量任重而道远，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下，也正是妇女/社会性别学科进入中国教育主流的契机。在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变的时代，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等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翻译与出版能使博士课程班在传统大学内部培育女权主义学术阵营的努力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

七门课程中有两门未能纳入这套丛书。因出版计划的变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双语教材已经在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孙中欣、张莉莉主编），而《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由艾晓明教授主编，2006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教材是密西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学研究生课程班（2002—2004年）上的阅读材料，这两门课程亦由密西根大学教授主讲。为免重复和浪费宝贵的翻译人力与出版资源，第一批收入这套丛书的读本共计五本：《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王政、高彦颐主编）、《男性研究》（王政、张颖主编）、《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冯芃芃、郑岩芳主编）、《社会性别与文化读本》（卢丽安主编）和《跨国女权主义研究读本》（李旭、郑岩芳主编）。

这套丛书能够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最需要感谢的当然是王政教授，如果没有她在中美间穿梭奔波、运筹帷幄，就绝对不会有我们这个博士课程项目，也绝对不会有这套丛书的出版。我在这里还一定要感谢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使我们在丛书文章的版权购买、翻译费与出版经费上得以后顾之忧。路斯基金会葛海伦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何进先生和孙巍女士对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工作所给予的理解、信任与帮助，点滴在心。《社会性别与社会》和《男性研究》两书

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后,后续几本却因种种原因拖宕至今,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史立丽编辑,伸出援手,解我困苦。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不才,忝居丛书主编,在此更要对参与这套丛书的选材、翻译、编撰、版权等工作的众多中美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正如王政教授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一书的序言里说到的: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只有更多学者的共同参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才可能在中国有长足的发展”。同样,作为一项参与式行动,我们诚恳地期待着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意见反馈。

陈 雁

2016 年 2 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序 言

高彦颐 王 政

自其发轫之初,女权主义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这个历程中充满了国别间和地区内观念的流转以及实践的变迁。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话语,女权主义也和其他的全球进程纠缠在一起,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等。这些进程中的复杂动态关系产生了现代社会地缘政治结构不平衡的本质,使得一般概念化的认识不可取。正因为如此,女权主义在特定区域内的发展历史,对我们理解局部区域与全球之间的互动非常关键,对增进我们对现代性形成的微观和宏观过程的了解也非常重要。简而言之,女权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全球的话语,而它在特定地区被接受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体现了翻译转换的政治的历史。本书将 19 世纪末到当代的中国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来深入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学者们对全球语境下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的关注,只是最近的事情^①,很多话题亟待展开。首先,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和概念意义上来看,

^① 参见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中国“女权主义”这个讨论对象本身是充满歧义、富有争议性的。在当代中国,对“feminism”有两个常见的译词,其一是“女权主义”。人们对该词的刻板印象是,女权主义者憎恨男人,渴望夺权,支持女权主义的都是一些“男人婆”。所以,目前在中国,女权主义是个颇有嘲弄意味的字眼,只在一些学者和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除外。与之相反,另一个译词“女性主义”(女性的,或指女性气质的特色),则看上去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可能是在语义上“女性主义”有着一些灵活性。然而,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女性主义”这个字眼才是带有贬义的,因为它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推崇阴弱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从而实际上强化了两性的人为区分,有悖于男女平等的追求。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立场不是女权主义的,但对中国的很多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的学者来说,这个翻译是“更温和的女权主义”,所以更容易被接受。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隐藏着一个复杂的争辩过程。这个过程从 1895 年起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女权主义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变化和社会转型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关于“女权主义”的具体含义的论争本身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中国追求现代性的重要一环。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论争的历史遗产,“女权主义”的含义,以及它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的地位,都令人遗憾地被忽视,甚至被恶意地曲解。本书收入了八篇文章,作者是来自中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分子,其学科背景也多有不同。本书试图说明,女权主义产生自“西方”,被翻译到一个具体的地域,这个地域有着自身的对社会性别、阶级、身体、性存在的理解。所以,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就产生了问题,也同时促生了很多可能。此外,这些文章也凸显了社会性别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不管其含义究竟是什么,被翻译过来的女权主义改变了现代中国人对其主体性和对历史的理解。

现代中国的编年史

本书收入的八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四个历史时期:晚清(1895—

1911)、民国(1912—1949)、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1949—1976)以及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1976 年至今)。在 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其邻国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迅速崛起,并充满殖民野心。两者力量的交替变化在东亚产生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1895 年,中国海军在日本海军面前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这使中国的改革家立刻给予日本双重的地位:日本是强敌,也是改革效仿的对象。艺术家和外交家带着学生的心态不断涌去日本。在欧美、日本、中国的三边关系中,这些访日人员促进了有关国家、社会性别和公民等新理念的流通。本书辑入了日本历史学家须藤瑞代的文章。在文中,须藤记录了“女权”(包含“妇女权力”和“妇女权益”双重意义)的概念在中国的产生过程,认为它是晚清全面改革法律术语和机构的努力的副产品。这是现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发端。

晚清的法制和军事改革在文化意义上富有独创性,但终究失败。1911 年,清朝灭亡。其后,中国进入第一个短暂的共和国阶段(1912—1915)以及之后的军阀割据阶段。然后,是第二个共和国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党时期(1927—1949)。在这段时期,政治和社会秩序得以在小范围内恢复。这段时期的中央政权控制没有很强的持续性和约束力。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一些新的社会阶级和主体身份产生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专业人员、工人、城市居民和“新女性”。本书收入了三篇文章,讨论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众出版物作为 19 世纪 70 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机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杂志“翻译”了权利、能动性等概念,把这种精英语从法律用语变成了日常词汇。陈铨乐(Carol Chin)是中美史专家,她综述了妇女杂志如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影响了萌芽中的妇女运动,以及如何影响了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的形成。历史学家江勇振和高云翔分别分析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妇女杂志》和《玲珑》。在法律改革的同时,这些大众出版物也在 20 世纪前半叶成为新理念传播的重要场所,这些理念在欧美、日本、中国三方中不断流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的话语场,把“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推到话语的前沿位置。本书收入了三篇关于第三历史时期的文章。在西方最近20年的著述中,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形象是霸权的,毛泽东的政策是严苛的。本书中的这几篇文章改写了这类老一套的观念。三篇文章揭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些概念在它的具体实行中非常具有争议性,而妇女的能动性可以在国家或官方的话语内外采取多种形式。

国家的话语被“翻译”成为地方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多重理解就成了可能。这一点在政治学家弋玫(Kimberley Ens Manning)的文章中最为明显。弋玫在文中讨论了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运动(1957—1961),提出了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研究视角。金一虹、高小贤是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她们的文章讨论了中国新一代女性典范——劳动妇女——的产生,分析了这些典范如何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出现,以及它如何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影响着这些妇女。本书的最后一篇是文学专家钟雪萍的文章。她分析了女性能动性与身体的关系,以及中国女权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的关系。她的文章也将我们对中国对女权主义的接受与创造的分析带到了我们上文提到的最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时期。

女权(妇女权利;妇女权力)之路

上文四个历史阶段是基于政治历史划分的,彼此泾渭分明。但由于语言学方面和话语进程上的连续、断裂和缺失,我们从这四个阶段中提出三个凸显的主题:女权这个概念的杂乱发展历程;媒体与女权主义者眼中的现代性;以及作为话语斗争场所的女性的身体。

对“妇女权利”的接受每每不同,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妇女运动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有两个主要的口号。其一就是“男女平等”。至今,对改革家来说,平等仍被认为是进步的目标,是一个让人向往的、世界性的、现代性的标志。但是,另一个口号“女权”,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被贬斥的过程。“女权”首先是个现代“西方”的概念,然后在晚清时期通过

日本被翻译到中文,成为意义明确的一个正面概念。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个概念已经被贬抑和忘却。本书中三篇关于毛泽东时期妇女政策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女权这个词(弋玫,金一虹和高小贤)。在钟雪萍关于当代中国的文章中,女权主义作为英语词汇 feminism 的翻译重新出现。但这时,女权主义已经难以摆脱被赋予的贬义了。

女权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舛。妇女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也是一样。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诉求休戚相关。就像须藤所指出的,女权这个字眼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当时,中国经历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然后,1900年,西方联军镇压了义和团的反抗。这些事件都促使当时积患的清政府改革新政以谋求现代化。这时,中国男性改革者开始呼吁“人民的权力”“民权”“人权”或“天赋人权”。女权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女权主义这个概念和词汇的引进,是中国努力建立一种西式的民族国家以抗击西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的副产品。换言之,从一开始,这个女权主义的诉求就和一个问题百出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诉求纠缠在一起。“妇女的权利”原应是从男女都享有“天赋人权”这样的理念上产生的。但是,在当时中国男性改革者的眼睛里,提倡妇女权利,是为了巩固国家。再者,这里所想象的国家,是仿效西方模式的国家,这种西方模式是以严格的男女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中国的改革家都没有注意到,“天赋权利”是个中性的概念,而西方的国家则是基于性别区分的实际操作的。这两者之间在本质上的内在矛盾也随着翻译传到中国,在中国发生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边界和意义的种种争论,不过是这种矛盾性在中国本土的表现。

须藤分析出四种晚清有关“女权”的解释。这些解释让我们对20世纪初社会性别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种观点有所了解。金天翮将女子看作是“国民之母”,秋瑾则认为女子对于国家和男子有着“同样之责任”。两者都将妇女的责任认定为巩固和加强国家。金天翮主张将女子的传统职责放进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而秋瑾以男人的角色为准则来获得国家富强和男女平等。另两种立场更为激进。张竹君讨论了没有性别区分的新的女子角色;何震反击了男权的国家民族主义,从而开启了新的理

论的可能性,使超越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此基础上产生的性别二元对立成为可能。

陈铨乐探讨了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有关妇女权利的论争。这些论争表明,当时中国的女性精英非常明确地致力于树立她们对现代性以及新女性身份的观点。她们经常比较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的地位差异,呼吁提高妇女在教育、经济独立性、运动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被翻译到中国的西方妇女的传记和相关信息,为中国妇女新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翻译过程很容易被理解作为一种被西方所操纵的单向流动的过程。但是,陈铨乐指出,这个翻译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女作家和读者谨慎地讨论着现代性的不稳定含义。这是一个既为国家也为妇女寻找新的身份的过程。有关“新女子”的讨论在印刷媒体中一直很热烈,即使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失败的 1912 年也是如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4)期间,关于“女权”的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讨论焦点和理论背景上都有所变化。江勇振研究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妇女杂志》。他发现,杂志受从日、美、欧等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决定论、优生学、性学等理论的影响,推崇母职。这种新的、“科学的”对母亲身份的提倡,有别于 20 年前男学者对“国民之母”的推崇。妇女不但享有成为母亲的天赋权利,而且还应该追求浪漫的爱情,这样才能保证后代更健康。这种把“女性”与“自然”生理等同的所谓“科学”话语虽然问题重重,但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使“女权”这一概念扩展到包括性权利、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以及离婚的权利。

在“五四”运动时期,有关“女权”的含义的讨论特别激烈,观点也常相左。有一些论争在本书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在这里有必要一提,因为这些争论后来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场中消失了,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五四”时期的杂志除了大力倡导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母职运动,同时也刊登大量女权主义的文本,介绍全球语境里的“女权”运动。“女权”开始与“主义”相联系,形成了复合名词“女权主义”。这是当时中国对“feminism”的多种翻译之一。1922 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女权主义组织,要求给予

妇女多种权利,包括平等的参政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以及自由结婚与离婚的权利。在这类讨论中,女性的权利导向更多是倾向于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国家民族主义。但是,随着女权主义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有了有组织的表达方式,取得一个男性的主体位置就开始变得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享男性的特权与权利。这样,须藤所分析的 20 世纪初的四种女权主义立场,在“五四”时期对“女权”的大讨论中,秋瑾的立场成为最突出的观点。在一切公领域扮演和男性一样的角色被看成是获得男女平等的关键。就像高云翔在文章中所分析的,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思潮表现为女性对强壮体魄的热衷提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初期就支持“五四”女权主义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要求。事实上,共产党的几个主要的创建者都曾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与倡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开始将这场女权争论引导到社会主义诉求中,把重点转向提倡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别。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为了达到争取支持者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排斥性的策略,开始了对女权主义的嘲讽。共产党仿效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把一些不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坚持把重点放在男女平等上的女权主义者称为“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同盟,而不是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所以,共产党可以一边支持强调“妇女权利”的党内女权主义议程,一边贬低“女权主义”,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使得共产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后来学会了怎样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话语空间中谨慎运作,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

本书收入的讨论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三篇文章里,都没有出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这说明,在当时,“女权主义”已成为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学术界缺乏关于“女权”的讨论,社会上也关闭了妇女自发的社会组织活动空间。但是,“女权”这个词被改变成“妇女权

利”^①，而关注“妇女权利”或“妇女权益”成了全国妇联的合法领地。妇联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受党领导，由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创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妇联致力于保障城乡基层的妇女的利益。她们的工作拓展了民国时期城市精英们对“妇女权利”概念的理解和实践。弋玫、金一虹、高小贤的文章对此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具体研究分析，并探讨了当时其他一些实践，这些实践虽然没有女权主义的标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在最后一篇文章中，钟雪萍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女权主义”这个词又出现了。虽然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个字眼还含有贬义，但也说明在话语层面，以及在社会空间方面，女权主义有了论争和活动的可能。共产党不再控制着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权力，也不再控制其意义的流通。

媒体和女权主义对现代性的展望

在 20 世纪，女权主义话语主要是在印刷品中展开的，这是本书文章的第二个主题。目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和汉学家的观点颇为盛行，认为媒体和国家是极端霸权，或者说是压迫女性的。本书文章的作者并不苟同于这些观点。先前的研究过度强调国家的控制和媒体的操纵，没有为男女的能动性留下空间。

这里收录的文章试图说明，在全球影响、媒体、国家与妇女之间有着多层面的复杂的博弈。陈铨乐、江勇振和高云翔研究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发现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性别是占据中心地位的议题。不仅如此，妇女议题在急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中一直举足轻重。妇女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一个比喻，她们积极地参与了社会和政治运动，是想象和建设现代性这个历史戏剧中的重要演员。20 世纪早期，女性可以以编辑、作家和读者身份侧身信息社会。而且她们还能进入众多

^① 中共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妇女权利”这个词是在 1932 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时期。该词在中共的语言中始终是正面的，似乎与“女权”一词毫不相关。